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

程光炜 吴圣刚 主编



ZHANGYIGONG YANJIU

张一弓研究

吕东亮 编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

程光炜 吴圣刚 主编

张一弓研究

吕东亮 编著



编选说明

从最初动议到确定方案,再到最后完成,这套“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历时一年有余。因为,它绝不仅仅是已有研究成果的简单整合。首先,编著者必须通读该作家的所有作品,包括文学作品、散文随笔、演讲报告、文艺批评等等,形成对作家作品的感性认识和理性判断,这是编选作家研究资料的基础和前提。然后收集研究资料,要求尽可能全面详尽,网络、期刊、报纸、杂志、著作、作家本人及其亲友、故交等各种途径、各种渠道,越全面越好。最耗时、最费力、最艰苦的工作是资料的分类、甄别和遴选,它体现了编著者的眼光、立场、态度和学养,决定了研究资料的分量和品质。典型性、历史性、多元性是我们选文的基本原则,力求覆盖作家不同时段、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作品,兼顾专家批评和新锐批评,体现不同时期的文学生态和文化场域。总之,整个过程没有捷径可走,全是笨功夫、苦功夫。尽管如此,其疏漏之处肯定不少,恳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本研究资料共分四大部分,即作家“自述·访谈·印象记”、“研究论文选辑”、“作品年表”、“研究资料索引”。“研究论文选辑”以时间为线索,以“问题”为中心,先总论、后分论,同一“问题”相对集中,体现逻辑性和层次感,并努力体现作家作品研究的历史进程。对入选的文章,为了出版方便,作统一技术处理,删减了摘要、关键词,注释一律改为脚注,除对一些明显的文字和标点符号的疏误作订正外,其他方面包括注释的不完整、不规范,词语使用的不当等,则依旧保持原貌。“作品年表”部分按时间顺序排列整理收录,截止时间为2014年7月。只列入作品的首发、首印,作品的再版、转载不列入年表,海外翻译版本尽可能列入年表。期刊、著作均按年、月排序,报纸具体到日期。重要散文、发表的重要演讲等列入作品年表,但作家编辑的书目、研究资料等均不列入。“研究资料索引”包括单篇学术论文索引、学位论文索引、研究专著索引三部分,截止时间同样为2014年7月,均按刊发/出版时间先后顺序编排。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编委会没能与选用论文的作者一一联系,丛书出版后,将赠书一本,以表歉意和谢意!且本书用于学术研究而非商业目的,想学界前辈、同人亦能理解支持。在此真诚致谢!如需稿费,请与编委会联系。

编委会

2014. 10. 31

总 序

程光炜 吴圣刚

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呈现为多样、多态发展的趋势。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文学豫军”或“中原作家群”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和重要构成。之所以称之为“文学豫军”或“中原作家群”,是因为它呈现出群体性,是一个集合的概念。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个群体中的个体是孱弱的,没有独立呈现的分量。相反,正是一个个有分量的个体组成了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作家群体:姚雪垠、叶楠、白桦、李准、张一弓、南丁、田中禾、张宇、郑彦英、李佩甫、二月河、周同宾、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刘庆邦、李洱、柳建伟、孙方友、墨白、邵丽、乔叶、计文君等等,每位作家都有不凡的创作业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都是文学中的“这一个”。

地处中原的河南,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版图上不是核心地带,但在历史、文化地理图上却是积淀深厚的重镇。这里也在接受全球化的荡涤,也在搭载现代化的快车,但这里与中国当下的经济前沿存在着距离,呈现着现代化的滞后性。因此,河南在时代的节奏中存在着“时间差”。这使得中州大地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还氤氲着农业文明、历史文化的气息,也使得中原儿女在这种相对的“慢节奏”中对历史、现实和文化进行思考,精神和灵魂回归这片土地,并以中原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行着多种表达。走进历史,走进中原文化,是豫籍作家的共同选择。无论是身居河南的作家还是移居他乡的作家,他们的灵魂仍然栖居在家乡故土,并用他们敏感的触角细腻地联系和感受着中原文化,中原文化是他们精神发生的原点,河南历史和家乡生活是他们创作的源泉。对于这些河南作家来说,似乎只有这片故土和其中的点点滴滴才能够激活创作的灵性。正如阎连科所说:“我家住在一个镇子上,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那个村庄是我写作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情感源泉、想象的源泉。一句话,是我写作的一切的灵感之源。那个镇子奇妙无比,任何现实中的一件事情都可能是荒诞的、合理的。”^①正是在这种表达中,作家们完成了自己的一部部皇皇巨著,成就了当代河南文学的气象大观。

^①阎连科:《我的现实,我的主义》, <http://v.book.ifeng.com/book/ts/7332.htm>。

“中原作家群”不仅是河南的文学现象,也是全国的文学现象;产生于中原大地的河南文学,早已超越了这一区域空间。无论是二月河、李佩甫的作品红遍全国、传播域外,还是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李洱的作品的海外影响,都说明豫籍作家的作品是全国性的,也具有世界性的分量。这足以构成河南自己的文学史。关于河南文学和“中原作家群”研究,近十年来,随着作家作品的动态性呈现,更多表现为个案化的文学研究,而当代河南文学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则不够。这一方面与河南的经济实力及其对文化提升、带动能力的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学界、文学界对河南文学在当下中国文化地理学上的地位认识不足有关,特别是与本土学界的研究、推介的成绩有关。弥补这一不足,是一项浩繁的工作,但起步必须从基础开始。

资料整理无疑是学术研究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学术界目前关于河南作家的研究资料,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李准研究资料》、《姚雪垠研究资料》等有限的几种。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文学豫军”、“中原作家群”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阐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孙荪的《文学豫军论》等,该文系统性地评述了“文学豫军”的由来、构成及文化特征。二是“中原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刘增杰主编的《精神中原》以论文集的形式综合了学界对于中原作家群整体把握和作家研究的成果;张鸿声主编的《河南文学史·当代卷》则是系统描述当代河南文学发展的第一部史著;梁鸿的《“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以“外省”的视角考察河南文学,从文化的角度寻觅和审视河南文学;何弘的《超越还是重复——中原文学论稿》试图对“中原作家群”或中原文学作出一个整体性的描述。这些研究对于解说一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是必要的,但都是初步的,特别是对“中原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和整体性特征的研究,远未形成对“中原作家群”完整的、核心的解说,更没有评估、揭示出“中原作家群”的应有价值。因此,就需要有人真正深入下去,沉入到纷繁的资料中去,耐心、细密地梳理,把那些能够反映和体现作家创作实绩、作品价值和当代河南文学整体面貌的资料整理出来,形成完整、系统的当代河南文学的资料体系,为文学史的生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的一些老师近年来致力于河南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方向和领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作为一所本土的有长期人文积淀的高校,研究河南文学、推动河南文学发展是应有的责任。2013年起,文学院整合文艺学、现当代文学和写作学等学科的十几位教授、博士组成研究团队,集中开展当代河南文学研究。这个团队以博士为主,中青年结合,队伍整齐,潜力很大。他们首先从资料整理开始,扎扎实实开展研究工作。第一批选取“中原作家群”中影响最大的15位作家,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整理出《白桦研究》(陶广学讲师,

扬州大学博士)、《张一弓研究》(吕东亮副教授,武汉大学博士)、《田中禾研究》(徐洪军讲师,上海大学博士)、《张宇研究》(杨文臣讲师,山东大学博士)、《李佩甫研究》(樊会芹讲师,江苏师范大学硕士)、《二月河研究》(吴圣刚教授)、《刘震云研究》(禹权恒讲师,武汉大学博士)、《阎连科研究》(方志红副教授,四川大学博士)、《周大新研究》(沈文慧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刘庆邦研究》(杜昆讲师,南京师范大学博士)、《李洱研究》(王雨海教授)、《墨白研究》(杨文臣讲师,山东大学博士)、《邵丽、乔叶、计文君研究》(李群副教授,河南大学硕士)等13卷,资料选编力求翔实、准确、有代表性。第一辑告罄之后还会启动第二辑,甚至第三辑,目标是把“中原作家群”主要作家的资料完整、系统地拓展出来,真正为当代河南文学的深化研究做些基础性的工作。

由于编选者的眼界、学识、水平有限,疏漏、不足,甚至差错定然存在,敬请学界批评指正。

目 录

1 编选说明

1 程光炜 吴圣刚 总序

自述·访谈·印象记

3 张一弓 听从时代的召唤——我在习作中的思考

10 张一弓 太阳正在落山

11 苗梅玲 孤独的身影与浪漫的灵魂——张一弓访谈

20 张 永 李鲁愿 秦 华 静守孤独的自由：中原之子系列人物之张一弓

25 南 丁 张一弓弓未藏

29 张 宇 张一弓的命运之神

33 刘学林 孤独的跋涉者

39 张婷婷 我有这样一位父亲——女儿眼中的张一弓

研究论文选辑

49 阎 纲 “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读《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58 潘旭澜 胆识与艺术创新——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61 曾镇南 并不轻松的喜剧——读张一弓的三篇小说

65 刘锡诚 一条坚实的道路

78 张 炯 人民道德精神力量的礼赞——评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

84 刘思谦 张一弓创作论

96 周桐淦 失去的和缺少的——读《听从时代的召唤》致张一弓同志

101 谢望新 关于张一弓创作论辩的笔记

119 陈继会 张一弓：寻找与超越

126 孙 荪 英雄情结——张一弓创作思想之核

132 梅蕙兰 辉煌的瞬间与平淡的日子——张一弓与何士光创作比较

141 曹增渝 用激情和理性浇铸当代英雄——兼论张一弓对主流文学的意义

- 152 陈平原 不忍远去成绝响——张长弓、张一弓父子的“开封书写”
- 175 李遇春 告别与寻找——关于张一弓小说的话语转变
- 186 马治军 理性之光与理性之累——张一弓创作浮沉论
- 193 何镇邦 诗情与历史文化相交融的家族叙事
- 196 何向阳 历史的“张看”——评张一弓《远去的驿站》
- 199 叶永胜 家族传奇的温情回眸——评张一弓《远去的驿站》
- 206 赵修广 《远去的驿站》:张一弓的历史沉思与生命咏叹
- 212 刘 涛 历史小说的一种写法——《黄鹭鸟仍在啼叫》阅读札记

作品年表

- 219 张一弓作品年表

研究资料索引

- 227 张一弓研究资料索引
- 232 编后记

自述 · 访谈 · 印象记

自述 · 访谈 · 印象记

听从时代的召唤

——我在习作中的思考

张一弓

我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重新崛起,它的植根于当代生活土壤中的强大生命力,它对当代重大社会矛盾的深刻揭示和思考,曾是那样强烈地震撼和吸引着我,使我对文学长期害着的“单相思”变得不可忍耐了。我不争气地流下那么多的眼泪,把一段严酷的历史留给我的一个不可消灭的记忆推上笔端,写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希望它能够对社会生活产生一些认识的作用——我便这样地把自己交给了文学。感激《收获》的编者,他们从“自流”来稿中拣出了这篇习作,把它交给了读者;感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辟的一个新的时代,它成全了我对文学的一个并不轻松的抉择。

巴尔扎克说过:“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的秘书。”^①当我写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以后,才不无惶恐地意识到,我是在力不从心地做着这样的“秘书”工作了。

我不是一个好“秘书”。三年多来,我只写了十多个中、短篇小说,不多也不好。但我总在提醒自己:要追随时代的步伐,为正在经历着深刻变革的我国农村做一些忠实的“记录”。如果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记录了我对我国农民一段严酷的历史命运的痛苦思考,那么,《赵镗头的遗嘱》则试图记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农民表现出来的充满智慧和勇敢的历史主动性,他们对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新的道路的发现,以及他们为了肯定自己的发现而进行的斗争;《张铁匠的罗曼史》、《寻找》、《瓜园里的风波》则是农民刚刚赢得一个新的历史命运,而又负载着旧有的历史忧伤的亦喜亦惧的心理状态的纪实;《黑娃照相》仅仅是一个即兴的“人物速写”,写下了“过去在他身上留下的穷乏所形成的心理的和外表的印痕与被生活唤醒的对物质和精神的生活不断

①〔法〕奥诺雷·巴尔扎克:《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增长的需要之间的矛盾”^①，以及他对美好未来的确信；《流泪的红蜡烛》是迅速变动着的农村现实生活传递给我的一个使我喜悦而怅惘的新的讯息，这是一幅富裕和愚昧掺杂一起的色彩极不协调的图画，它反映着现实生活中新出现的物质生产有了较大发展而精神生活依然“贫困”的矛盾，以及农村青年在物质和精神生活这两个方面的高尚、美好的追求；我还应当提一提《最后一票》，这个短篇是从政治生活的角度，记录了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被唤醒的、此后都被遗忘了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重新激发出来的民主要求的一声呐喊。

当我回顾自己怎样追随农村变革的脚步，试图做一做“同时代人的秘书”的时候，常常感到我是在自讨苦吃。我发现，我是那样郑重而傻气地把自己推到重大的社会矛盾面前而毫无回避的余地了。因此，在我的文学习作道路上，必须对政治与艺术、歌颂与暴露以及吸收外来技法与表现民族的、时代的内容等重大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回答，否则我将寸步难行。

二

正如一些批评家所说，我的习作常常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有的甚至触及当前农村变革中的经济政策。这是一个使我深感惶惑的问题。

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在“艺术从属于政治”的口号下，出现过一批图解政策、为一时的中心工作效劳的作品，产生了实用主义的“运动文学”。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这不仅仅是由于政治和政策的失误“株连”了“从属”于它的文学，而且由于图解政策——即使是正确的政策，也违背了文学来源于客观生活，而不是来源于既定概念的根本规律，在哲学思想上也是同唯物论的反映论背道而驰的。当我重新开始小说习作的时候，我是幸运的。我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新崛起，已经打破了长期以来主观唯心主义强加给文学的沉重枷锁，使我有可能十分警惕地提醒自己，让我的习作行走在生活的轨道上，避免重蹈图解政策的覆辙。

但我产生了新的困惑。一个作者对生活作出的形象和哲理的发现，以及他不可遏止地试图表达他的发现的创作冲动，总是离不开他正生活其中的客观环境和他的社会实践的制约。作为一个同农民一起试行联产责任制的驻队干部，使我在关注着农民的历史命运、注视着现实农村中各种人物情态的时候，总是摆脱不了历史变革时期的政策对他们的重大影响，排除不了在农村现实变革中

^①曾镇南：《并不轻松的喜剧》，《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2期。

起着决定作用的政策的因素。文学是人学,要写出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典型,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我生活其中的环境和我的社会实践,总是使我情不自禁地从新的农村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物质生产形式的变更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中,观察不同人物在新的历史舞台上的各个不同的表演,他们在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心理状态上所产生的深刻而微妙的变化。在试行“包产到户”的第一个丰收季节——这在当时并未见诸于正式文件的倡导,而是出于农民的智慧的创造,围绕着这种管理形式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以及由此而来的“超产是否归己”、“奖罚是否兑现”这样一些是否真正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常识性问题,发生了何等激烈而尖锐的论争啊!在我蹲点的大队里,几乎每一户社员都在焦灼地期待着历史的一次新的裁决。四位女社员向我哭诉,要我在承包合同上“再咬个牙印”。一位中年汉子气恼地向我宣告:他要加高院墙,关上大门,在院子里打场,谁敢拿走他的超产粮,他就跟谁拼命!在坚持政策兑现之后,一个新的权威——劳动的权威,在农村出现了。一位历来不被人们注意的“实受货”,由于超产吨粮而使人们发现了他的存在,赢得了社会的尊敬;而一位习惯于不劳而获的大队干部去菜园私摘青菜的时候,却受到了菜园承包户的抵制和揶揄……来自一场深刻变革的连续、密集、令人激动不已的生活讯息,使我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并提醒我,应当干一干一个业余作者的活计了。

但我立即发现,使我激动不已的生活讯息里,却含有那么多的极不高雅、毫无诗意,而且与人们的肠胃系统有着密切联系的政策因素。这使我感到极大的惶恐了。我会不会重走图解政策的老路而陷入实用主义的泥沼呢?会不会被认为写了“急功近利”的“趋时之作”而惹来对我的人格指责呢?一个习作者的郑重的思考和一个凡夫俗子的琐碎的顾忌,使我踌躇不前了。但在这时,邻近公社里发生了一个悲剧:一对勤劳、善良的农民夫妇,因干部推翻联产合同,夺走了他们即将到手的超产粮,而双双服毒了。这一悲剧性事件极其强烈地震动了我,使我不能不在踌躇和焦虑中作出抉择了。既然历史转折时期的政策如此广泛而深刻地联结着千家万户的命运,如此强有力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既然这些政策是农民为之付出极大历史代价的智慧创造,那么当我试图反映现实农村的这一场深刻变革的时候,试图写出这一变革的比较典型的环境和具有较多的典型性的人物形象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对变革时期的变革的政策畏而远之,似乎不如此就不能使文学得到“净化”而成为不朽呢?图解政策的教训是值得永远记取的,但在纠正这一谬误的时候,试图把溶化在人民的生活和命运中的政治和政策的因素清理出去,是不是一种“把婴儿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的不幸呢?如果我在文学习作的全过程中牢牢记住

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那么,当我在社会生活中,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中碰到了政治的,甚而是政策的因素,是否可以不必避开这些因素,而把这样能否写出大约每一位作者都希望写出的不朽之作的批准权暂且交给历史,而心甘情愿地写一些可能“速朽”的文字呢?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写了《赵镏头的遗嘱》以及以后的刻有农村这场变革的历史印痕的《黑娃照相》、《寻找》、《瓜园里的风波》等姑且叫做“一个驻队干部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记录”的文字。

不要图解政策和任何既定概念,但也不要避开政策对历史、对你所要写的人物命运以及他的形态和心态的重大影响;不要搞实用主义的趋时之作,但也不要拒绝接受不断变动着的时代通过活鲜鲜的人物形象传递给你的生活的指令。这是我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我生活其中的具体环境以及我正在进行着的社会实践,对我提出的一个要求,而并非对我的习作在选材上的全部要求和概括。

生活的领域是无限广阔的。政治和政策并非构成社会生活和人物性格历史的无所不在的因素。每个作者都有自己所熟悉的生活领域以及属于他自己的包括选材习惯在内的写作个性。当我对自己习作中碰到的一个问题作出抉择时,并不以此衡量别人的作品,“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①。

三

由于我的习作大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并常常触及变革时期的政策,这就使我常常产生另一个困惑:我的每一篇习作几乎都受到过两种截然相反的批评。有的不无激动地说它是“居心不良”的“暴露”,有的则不无嘲讽地说它是“趋时”的“歌德”。好像为文学作品准备了两把椅子,必须在其中的一把椅子上对号就座。甚至像《黑娃照相》这个着重在新旧杂陈的时代背景上表现人物心态的短篇,大概是由于黑娃已经能够用饲养长毛兔挣来的三元八角钱照一张彩色相片,加之在社会背景上写了“责任田”、“专业户”的缘故,它被列入“很有应变能力”的“宣传工具”之中了。不幸,由于同样的原因,又有人质问道:难道落实农村新经济政策之后的农村青年,只能够在一张彩色相片里“画饼充饥”吗?由此可见,黑娃之黑,纯属作者的肆意涂抹。同时,由于在黑娃赖以存在的新旧杂陈的时代背景上写了庙会 and 香客,又有人发现,这个“简单的宣传工具”

①〔德〕卡尔·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会》。

正在宣传着封建迷信,等等,等等。

对于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批评,我必须要求自己不要由于其中包含着的过分激动和小小的讥刺而跟着激动起来,这里需要的是心平气和的讨论。

我没有想过要把自己的习作放在“暴露”抑或是“歌颂”的模式里,而是试图让“暴露”与“歌颂”共居于一个“对立的统一体”中。通过对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的阴暗面的不加粉饰的暴露,激发出我对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的光明和希望的热烈的讴歌。这与其说是我主观上试图这样做,倒不如说生活的本来面目要求我这样做。

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总是让人们看到现实生活中两种“现实”的存在:一种也许是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上或某一个局部环境中占据优势的黑暗势力,但它在总的趋势上却在消亡着,正在失去它的必然性和现实性;而与之矛盾冲突着的对立面——也许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上或某一个局部的环境中居于劣势的进步力量,却在斗争中成长着,正在愈来愈惹人注目地表现着它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其哲学基础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应当能够对这两种“现实”作出符合它们本来面目的反映,从而使人们既能够坚持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而又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划清界限,既吸收浪漫主义文学的强烈的理想光芒而又把理想的光芒置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

我喜欢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大师雨果老人提出的美、丑对照原则:“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①但我在理论和实践上不能到此止步。因为生活中不仅存在着美与丑的矛盾对立,还存在着前者代替后者的永无止息的矛盾斗争。毛泽东同志说过:“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②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我常常告诫自己,不要回避社会矛盾,去进行粉饰社会生活的廉价的歌颂,因为它无异于既要歌颂武松而又不许武松打虎那样,叫施耐庵老先生啼笑皆非;同时我也提醒自己,不要孤立地暴露黑暗,不要让人们产生只看到阳谷县令在景阳冈贴出“大虫伤人”的告示,却不见打虎的武松的悲伤。我不是说,我在每一篇习作中都要表现重大的社会矛盾冲突,并在这种矛盾冲突中塑造出英雄人物和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但在我的创作指导思想和总的倾向上,将尽力掌握生活中的美、丑对立及其在斗争中互相消长的辩证法。

“他的作品里充满着浪漫主义的因素,正是这种浪漫主义投注给他的作品

①[法]维克多·雨果:《雨果论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30页。

②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

以生活之光。他的作品里当然也显示着强有力的批判精神,正是这种批判精神加强了对社会生活认识的深刻性。”^①对我的一些习作的上述溢美之词使我感到愧疚,因为我自知我的一些习作辜负了这段评语。它说出的是我不曾达到的,却是我所追求的。如果用一句话表明我的追求,那就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精神与高昂理想的统一。

四

内容决定形式。在重大的社会矛盾冲突中反映不断变化着的现实生活,从而把批判精神与高昂理想结合起来的要求,使我不敢小视情节的作用。我感到,小说的情节即是环绕着人物,并促使人物在其中采取行动的矛盾冲突。离开了情节结构,我的人物将失去他赖以存在并在其中表现自己的社会环境。我甚至偏爱生活中的特异事件和异常尖锐的矛盾冲突,喜爱浪漫主义文学在情节结构上常常采用的大开大阖、大起大落的结构方法,促使人物在这样的情节结构中采取强烈的行动。这也许有利于表现重大的社会矛盾冲突,有利于在较为广阔、雄浑的历史图景上描绘自己的人物,有利于给较多的读者带来较为强烈的感染力。

但对特异事件和外部情节结构的偏爱,无疑是我习作中的一个局限。它不仅限制了我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里选取素材的可能性,而且不能使我对人物的心理状态作出直接的透视,揭示人物内心的真实,这就损害了人物的丰满性和生动性。因此,在《黑娃照相》、《寻找》等习作中,我试图在生活中选取并非惊心动魄的事件,吸收西方小说中心理结构的方法,以打破这种局限。但我这样做的时候,仍然十分谨慎地充当着我的人物的叙述者,即使在《寻找》中表现马套的潜意识的时候,也唯恐读者不知所云而要由我对它作出叙述和解释。我也没有勇气离开外部的情节结构,致力于人物主观意识的流动,因为我唯恐使我的人物离开外部世界的现实关系而变成无所依附的“游魂”。我在提醒自己,要把外部结构与内部心理结构结合起来,以外部的情节结构为基础,把人物的心理活动作为外部世界的矛盾冲突在人物内心世界激起的波澜和回声。即使像《黑娃照相》这篇不是按照传统的情节结构的要求,而主要表现人物心态的习作,也要把黑娃的心态附丽在黑娃赶会的情节之上,让黑娃赶会的外部情节载负着黑娃的心理活动的流程。

^①刘锡诚:《一条坚实的道路》,《莽原》1982年第4期。

农村现实生活中新旧杂陈的斑驳色彩和繁杂音响,也使我感到需要对叙述农村现实生活的语言作一些调整。我在人物的语言中,采用了自己比较熟悉的豫西乡土语言,而在叙述语言中吸收了一些欧化的成分。如在《流泪的红蜡烛》的开头,用了六个“在……之后”组成的介词结构的并列状语;《黑娃照相》的第一句,也是欧移的倒装句、复合句。我希望这样的句式能够增加语言的表现力和“讯息量”,造成跳荡的感觉和奔腾的气势。

把情节结构与心理结构织在一起,把乡土语言与欧化句式揉在一起,都属于对外来的表现手段的吸收。对此,我也曾有过踌躇和疑虑,唯恐失去我所表现的中原农村的“红薯味”。当我在一个农学院受了短期训练以后,才知道红薯是菲律宾的舶来品,而在中原农村广为种植的玉米,却是从拉丁美洲引进的。既然红薯和玉米可以被我们民族的土壤和肠胃所接受,变成自己的东西,那么,一些外来的文学表现手段,也应当是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农村生活的文学可以消化的。

然而,诚如一位批评家指出的:“在艺术形式上,他却常常表现出平庸,缺乏创造性。”当我在艺术形式上进行一些“土洋结合”的尝试时,也常常感到一个乡下大闺女用不好现代化妆品的懊恼。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广阔庞杂的内容与比较窄狭拘谨的形式之间的矛盾”^①所造成的懊恼。我将不断寻求解决这一矛盾的艺术途径。

当我就要结束这篇啰唆文章的时候,好像重新沿着我的短短的习作道路进行了一次艰巨的跋涉。我不是在叙说自己已经达到的,而是在说明我所追求的,其中可能包含着许多谬误。为了使自己能够在一条不那么好走的道路上走得较好一些,我期待着检验和批评。

1983年2月27日凌晨于郑州

原载《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

①刘思谦:《在现实的发展中反映现实》,《奔流》1983年第2期。